

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

[作者] 程焕文

[单位]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

[摘要] 文章从“三位一体”——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历史遇合，“三维一体”——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理想唱和，“跨越时空”——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精神力量三个方面论述了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

[关键词] 图书馆精神，三位一体，三维一体

裘开明先生是 20 世纪西方最伟大的东亚图书馆先驱和华美图书馆学家 (Chinese American library scientist)。因为我将会在即将撰写的《裘开明先生评传》中全面地描述裘开明先生的生平事迹、阐述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学术思想、总结裘开明先生对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乃至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卓越贡献，并客观地评价裘开明先生的历史地位及其对西方汉学研究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今天不准备详细地阐述裘开明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我要与各位分享的是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精神。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不仅是因为精神既是永恒的，又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且还是因为精神既是最令人感动的实在，也是最能够催人奋进的力量。下面，我将从“三位一体”、“三维一体”和“跨越时空”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精神。

1、“三位一体”——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历史遇合

哈佛燕京图书馆创始于位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总馆——怀德纳图书馆 (Widener Library) 的“汉文文库”(Chinese Collection, 又称“汉文图书馆”或“中文图书馆”), 发展于位于博伊尔斯顿楼 (Boylston Hall) 的“汉和文库”(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和“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 兴盛于位于神学路 (Divinity Avenue) 的“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每当我走到哈佛燕京前面看到路标上“神学”(Divinity) 这个单词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三位一体”(Trinity) 这个单词，有时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在基督教教义中“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我不信教，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今天哈佛燕京图书馆坐落在神学路会不会是某种因缘的结果？我不想就此做一些“唯心主义”的求证，但是，我不得不说明的是：在许多方面，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确是“三位一体”的。也许，并非每一位在座的专家学者都很熟悉太平洋彼岸的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他们怎么会与太平洋此岸的裘开明先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

韦棣华女士 (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1864-1931), 1861 年 8 月 22 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巴达维亚 (Batavia) 附近的一个名叫埃尔巴 (Elba) 的小镇。1889 年，韦棣华女士走出家门，开始从事社会工作，担任纽约州巴达维亚“理奇蒙特纪念图书馆”(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 Batavia, New York) 的第一任馆长; 1899 年, 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原因, 韦棣华女士只身赴中国武昌探望其幼弟韦德生 (Robert Wood) 牧师, 后因怜惜武汉民众的疾苦和教育条件的不足, 遂决定留在中国, 并立志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 提高民众的智识。她于 1910 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公共图书馆意义的图书馆——文华公书林 (Boone Library, 请注意“公书林”这个特别名词的独特意味); 1920 年与沈祖荣先生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Boone Library School, 以下简称“文华图专”); 1924 年促成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 并因此于 1925 年发起并促成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 1927 年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在英国图书馆协会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与其它 14 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IFLA); 1931 年 5 月 1 日 因病在武昌逝世。作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山鼻祖, 韦棣华女士曾被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将军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The Queen of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1]。

沈祖荣先生 (Samuel T. Y. Seng, 1884-1977), 1884 年诞生于湖北省宜昌市, 少年时由于家境贫寒一直无缘读书, 1903 年获湖北宜昌圣公会教堂推荐, 只身到武昌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学校——文华书院 (Boone College, 1916 年 组升为文华大学, Boone University) 免费求学; 1910 年文华大学毕业后, 因深受韦棣华女士精神的影响, 毅然决定放弃一切升官发财的机会, 投身于韦棣华女士创办的文华公书林, 担任协理 (副馆长), 致力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 1914 年受韦棣华女士的资助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chool) 留学, 开创了中国赴美攻读图书馆学的先导; 1917 年学成回国后发起了席卷全国的新图书馆运动; 1920 年与韦棣华女士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并担任文华公书林总理 (馆长) 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长达 30 余年; 1925 年参与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 并长期担任主要职务; 1929 年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IFLA) 第一次大会, 揭开了中国图书馆人参与国际图书馆活动的序幕; 1941 年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创办档案管理科, 开创了中国档案学教育的先河; 1977 年 2 月于江西省庐山逝世。沈祖荣先生培养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占 20 世纪上叶中国图书馆专业 人才之大半, 且遍及海内外, 被海内外共誉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The Father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2]。

裘开明先生 (Alfred Kai ming Chi u, 1898-1977) 1898 年生于浙江镇海县, 1912 年 (?) 就读于湖南长沙的美国圣公会学校——St. James Middle School (湘雅中学?); 1915 年被美国圣公会推荐免费攻读文华中学, 1918 年又被推荐免费攻读文华大学; 1920 年因深受韦棣华女士精神的感动在文华图书科创办时改修图书馆学, 1922 年毕业, 成为中国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 (仅 3 人); 1922 年文华图书科后担任厦门大学图书馆 第一任馆长; 1924 年受厦门大学的派遣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 1925 年考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经济系攻读经济学 (同时继续完成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的一年实习课程), 并分别于 1927 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于 1933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27 年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汉和文库主管 (Custodian of th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自 1931 年起一直担任美国第一个东亚图书馆 (请注意 Collection 与 Library 之间的差别, 以及 Custodian、Curator 和 Librarian 之间的差别)——哈佛大学图书馆汉和图书馆馆长 (Librarian of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1965 年在担任了 38 年馆长退休后应邀赴明尼苏达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图书馆创办其东亚图书馆; 1966 年又应邀赴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首任馆长; 1977 年 11 月于剑桥逝世, 被誉为“美国东亚图书馆馆长之领袖”(Dean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3]。

我之所以说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是“三位一体”的，是因为他们三位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密不可分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其一、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具有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早在 1903 年沈祖荣先生就读文华书院时，韦棣华女士就是沈祖荣先生的英文老师。自 1910 年起，沈祖荣先生开始追随韦棣华女士左右从事图书馆事业。从早期的师徒式图书馆学教育模式来看，沈祖荣先生可以算做是韦棣华女士的开门弟子。重要的是，他们的这种师生关系具有与通常的师生关系迥然不同的意义：一方面，韦棣华女士不仅是沈祖荣先生的图书馆学启蒙老师，而且还一直是沈祖荣先生从事图书馆事业和研究图书馆学术的导师。另一方面，沈祖荣先生既是韦棣华女士的学生，又是韦棣华女士的最忠实的事业继承人，还是韦棣华女士最信赖的朋友。

裘开明先生是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于 1920 年在武昌昙华林正式开始设坛教学的开门弟子。作为“文华图专”的第一届毕业生和“文华图专”第一个最忠诚图书馆事业的杰出代表，裘开明先生与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的这种师承关系同样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承关系，而是一种决定人生和理想的师承关系。所以，在研究裘开明先生的过程中，我们不可以忽视这种师承关系的影响力。

如果没有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的图书馆学启蒙教育和精神感召，我们就无法想象裘开明先生投身于图书馆事业的人生抉择。

1922 年裘开明先生在“文华图专”毕业后其第一个图书馆工作职位——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是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推荐的。裘开明先生虽然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只做了两年多的馆长就来到了美国，但是，裘开明先生对这份荣誉一直十分珍惜，他在他后来的论著中经常并列题写“原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和“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馆长”两个职务，这本身就是很好的说明。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学人赴美攻读图书馆学之风渐盛，而尤以赴著名大学者为多，为什么裘开明先生要选择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除了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的推荐以外，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沈祖荣先生的影响。可以说，裘开明先生是沿着沈祖荣先生十年前赴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之路而来到美国的。这的确是一件回味无穷的故事。

沈祖荣先生在“文华图专”一直讲授的课程是“图书分类法”和“图书编目法”，这些课程对裘开明先生影响深远。我们只要看一看裘开明先生的三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力作《中国图书编目法》（1931 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1938~40 年）和《汉和图书分类法》（1943 年），就不难看出这种影响的深远性。

裘开明先生对他的老师一直十分尊崇。在 1931 年韦棣华女士逝世时，他专门撰写了《韦棣华女士传略》一文以纪念韦棣华女士，30 年后他又专门为《Notable American Women, 1607-1950》撰写了“Mary Elizabeth Wood”的千言条目，其对韦棣华女士的崇敬之情跃然纸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裘开明先生曾先后两次回中国，虽然其主要目的是赴河北省做农村调查和在北京哈佛燕京学社及燕京大学图书馆校勘自己的著作，但是，他每次都不远千里专程到武昌“文华图专”去拜访他的老师沈祖荣先生。那时，裘开明先生已经是在海内外国内具有相当影响的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馆长，但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的报道一直称裘开明先生为“裘开明同学”，那种师生的情谊同样是跃然纸上，充满了温馨。

其二、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均信仰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Christian）。如果仅从基督教信徒这种共性上来讲，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因为在美国和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的确是太多和太普通了。但是，当这种宗教的精神发挥到图书馆事业之中并产生共同的图书馆精神的时候，当这种共同的信仰作用到人生之中并导致共同的人生道路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

上的共同信仰问题。

韦棣华女士赴中国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教信徒,但是她到了武昌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文华大学以后,由于在图书馆事业方面的突出贡献,或者说也可以说她所做的一切因应了基督教“服务大众”的理念,后来武昌美国圣公会曾授予韦棣华女士“世俗传教士”(Lay Missionary)的称号(因为关于韦棣华女士的图书馆精神我另有专著论述,所以这里不赘述)。

沈祖荣先生 17 岁时才开始读书,如果没有武昌美国圣公会提供的读书机会,沈祖荣先生后来恐怕也不会成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信仰基督教,并将基督教之精神发挥到图书馆事业之中,以“智慧与服务”作为“文华图专”的校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智慧与服务”精神且享誉海内外的图书馆人才。但是,不幸的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他只能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完全埋藏在心里。

裘开明先生由于从湖南长沙湘雅中学到湖北武昌文华大学一直读的是教会学校,所以,他信仰基督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受到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的“智慧与服务”之精神的影响,那么,我们很难想象他在文华大学 3 年级时为什么会改选当时没有几个学生愿意学的冷门图书馆学专业。在座的各位专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么样的两个问题:为什么裘开明先生在 1925 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毕业以后要继续到哈佛大学来深造而不是其它的大学?为什么裘开明先生在攻读完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以后不去谋求待遇更为优厚的经济方面的职位而要投身于东亚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之中?

我原来对这两个问题也比较纳闷,但是当读了裘开明先生自己写的《一个馆长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Librarian)以后,我开始有点明白个中的原委。在这篇回忆录中,裘开明先生专门写了一段看似多余却蕴涵着“玄机”的文字:“1924 年秋,我受厦门大学的派遣赴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到达美国后,我首先就来到了剑桥和哈佛拜访我以前的老师 James Muller 博士,他是我在文华大学时的“德语”和“美国史”任课老师,后来做了(剑桥)圣公会神学院(Episcopal Theological School)的圣公会历史(Church History)教授。那时,我就已经下定决心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毕业以后就到哈佛来读书。”[4] 这种心迹的表露可以算做是上述问题的部分答案。

由于圣詹姆斯教堂(St. James Church)的第 7 任教区长 Rector Paddock 牧师的影响,裘开明先生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就一直是该教堂的忠实教友。他有三个小孩是在这个教堂洗礼的,他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也是在这个教堂结婚的。我已先后数次访问过圣詹姆斯教堂,在教堂的法衣室(Vestry)有一扇彩色玻璃窗是裘开明先生的儿女专门设立纪念其父亲的。这扇彩色玻璃窗上彩绘的是玫瑰花,与旁边的另一扇绘有百合花的彩色玻璃窗交相辉映。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不采用比较普遍的宗教人物像,而要使用与众不同的玫瑰花作图案。后来,读了《圣经》“所罗门颂歌”(Song of Solomon)中的“I am a rose of Sharon, a lily of the valleys.”,我开始有点醒悟:所罗门是古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不正是以智慧而著称的吗?后来,我又到奥本山公墓(Mt. Auburn Cemetery)去祭拜过裘开明先生。裘开明先生的墓碑上除了雕刻有十字架以外还专门刻有“教会”二字。我想我讲了这些儿见闻,差不多可以说明我要说明的问题了。

其三、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同是划时代的先驱者。

近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界渐渐开始重视对杰出图书馆人物的研究,开始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反观美国图书馆学界对于杰出图书馆人物的研究,虽然不能说不重视,但是“问题”也不少。例如:杜威(Melvil Dewey)是世界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但是,美国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完整的杜威传记;相反印度倒是对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刚纳赞(Ranganathan)的研究要充分得多。我觉得在 20 世纪已成为历史的今天,我们应该对 20

世纪的图书馆人，尤其是杰出的图书馆人给予充分的评价。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常常比较强调“时势造英雄”这一面，但往往容易忽视“英雄造时势”这一面。从“英雄造时势”这方面来看，杰出历史人物的贡献往往是具有标志性的。对于这种标志性的贡献，人们常常会用“里程碑”来形容。当然，就“历史的里程碑”而言，它也有10年、20年、50年等不同时间距离的里程碑之分。或者说，“里程碑”具有“阶段性”和“时代性”的差别。

我觉得，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图书馆事业的先驱对于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和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在许多方面都是“划时代性”的，我在前面列举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么多个“第一”就是这个意思。作为一项事业的开创者或者“第一人”，他（或者她）当然不仅仅代表着一个阶段的开始，而且往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划时代的标志。1854年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留美毕业生，他标志着中国人留美历史的开始。1879年戈鲲化应邀到哈佛大学来讲学成为哈佛大学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标志着哈佛大学汉学（或者亚洲学）研究的开始。这些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在图书馆事业方面正是这种划时代的先驱者。

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不仅是划时代的先驱，而且又都是一代宗师（对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专门说明）。我时常在想：英文的“Confucius”（孔子）和“Mencius”（孟子）这两个圣人的名字的确是翻译得好，因为它的直接中文意思就是“孔先师”和“孟先师”。从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和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的历史贡献及其历史地位来看，我们是否可以在英文上采用“Woodcius”（韦先师）、“Sengcius”（沈先师）、“Chiucius”（裘先师）这些新名字尚值得研究，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在这个报告中称他们为“女士”或“先生”，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女士”“先生”，而是指“宗师”或“大师”。

2、“三维一体”——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理想唱和

当我用全方位的视野来审视“图书馆世界”（Library World）的发展时，我发现：“图书馆世界”是一个很有趣的“三维空间”——一个由“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组成的“三维世界”。图书馆学研究者对这“三维”的着眼点和着力点的差异最终必然导致他们所反映的“图书馆世界”的差异。在这里，我不妨借用一点“数学语言”来描述一下这个“三维世界”及其特点。

第一维（“X维”）是“图书馆事业”，包括图书馆、图书馆学术、图书馆学教育等等。通常，图书馆学研究者比较注重对这一维的研究，但是，如果只局限于这一维的研究，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书馆世界”的发展只是一种“线性历史”。这种“线性历史”往往使“图书馆世界”的发展显得单调和枯燥乏味。

第二维（“Y维”）是“图书馆人”，包括图书馆从业者、图书馆学教育者和图书馆学研究者等等。在“图书馆世界”的发展中，“图书馆人”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图书馆学研究者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人”结合起来研究时，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书馆世界”的发展将是一种“平面历史”。这种“平面历史”自然要比“线性历史”全面生动得多。

第三维（“Z维”）是“图书馆精神”。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图书馆人也许具有不同的“图书馆精神”，但是这些不同的“图书馆精神”总是有着许多的共性。我时常将中国的“图书馆精神”概括为“四爱”——“爱国、爱馆、爱书、爱人”；将“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精神”概括为“智慧与服务”，虽然这些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当图书馆学研究者从“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三维空间来研究“图书馆世界”的时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书馆世界”的发展将是一种“立体历史”。这种“立体历史”不仅能够全方位地展现“图书馆世界”的发展，而且还能展现“图书馆世界”的发展动力。

在“图书馆世界”中并非所有的“图书馆人”都具有“图书馆精神”。只有以发展图书馆事业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并献身于图书馆事业的“图书馆人”才具有真正的“图书馆精神”。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对人生理想的孜孜追求正是“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三维一体”的生动演绎。

作为一个美国人，韦棣华女士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图书馆事业？

过去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大陆的图书馆学研究者习惯于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传教士之使命，并由此推导出韦棣华女士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马前卒”。这当然是幼稚和荒谬的。虽然韦棣华女士曾经拥有“世俗传教士”的称号并在教会学校文华大学创办了文华公书林和文华图专，但是，她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努力摆脱教会的影响，并最终使其图书馆事业完全独立于教会之外自行发展。所以，我们不可以将韦棣华女士献身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归结为传教士之使命。

可以说，韦棣华女士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图书馆事业，完全是因为人生理想的追求。这种人生理想的追求首先是良知与道德的自觉与弘扬，然后是生命与理想的归属与倾注。1899年，韦棣华女士带着惶恐的心理第一次到达中国去探访其弟弟时，她亲眼所见的不是外国媒体所渲染的那种充满仇恨与血腥的中国，而是一个贫穷落后与民智未开的中国。因为有感于武汉民众生活的疾苦和教育程度的低下，韦棣华女士颇有救济之意，遂决定暂时留在中国以尽个人的微薄之力帮助武汉的民众。起初，韦棣华女士只是在文华书院担任英语教师，后来她发现教书无法实现匡济民众的初衷，于是，开始办理公共图书馆，使普通民众均有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从那时起，韦棣华女士就已经立志通过献身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来实现其服务中国民众的人生理想。

其后，韦棣华女士的这种“创办人之精神”一直在不断地发扬光大。对此，毛坤先生在1930年时就已经做过比较准确的说明：“创办图书科者，美国韦棣华女士也。女士来华服务已三十年。初十年任教职于文华大学；十年后创办文华公书林；二十年后创办文华图书科。女士一生志愿，在辅助中国，发扬文化。其首先着力之点，为图书馆事业。欲发展图书馆事业，首在人材之养成；故创办图书科以为根基。对于办理之人，则先期补助沈祖荣胡庆生两先生留学美国专学图书馆学以便归国办理。对于经费则中外奔走，劝募维持；辛苦倍尝，十年一日。其坚韧卓绝，远思长虑之精神，不可及也。”[5]

1939年12月，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曾评价白求恩道：“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们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6]我以为：虽然韦棣华女士来华的情形与白求恩有所不同，但是，韦棣华女士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尤其是韦棣华女士的精神，较之白求恩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20世纪初的一位凤毛麟角的大学毕业生，沈祖荣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生毫无

保留地奉献给中国图书馆事业？

沈祖荣先生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的理想是通过办理图书馆事业来实现教育救国和教育强国。1910年，沈祖荣先生在文华大学毕业之后毅然决定供职于文华公书林，以启迪民智，振兴中华。当时对于沈祖荣先生的这一抉择，旁人不可理解，亲朋好友谁都不赞成。当面阿谀奉承的说：“方今各处需才孔亟，以你大学毕业，何事不可为？乃作此招护书籍的事业，不其长才短驭？”背地里议论，不是说：“毫无远志”，就是说：“学识平庸，不能充当学校的教员，不能做洋行的买办或写字，只有涸亦书丛，做书班的事业，这种整理书籍的工作，花费数元，雇一个失业的书贾担任足矣，何以在大学毕业之后，反去做这种工作，真不可解”[7]。类似的冷嘲热讽，在风气未开的当时虽然使沈祖荣先生压力重重，但是，沈祖荣先生只能付之一笑，其立志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

在留美期间，沈祖荣先生深深地感到：“一个国家的文明既不依赖于她在海上拥有多少一流的战列舰、无畏战舰和潜艇，也不依赖于她能动员多少装备精良的军团，即使这是获得尊重和免受侵犯的必需品，而是有赖于她拥有多少高效的学校、学院、高质量的大学、消闲公园和充足的图书馆”。因为“学校乃是人民受教育的场所，博物馆艺术馆是保藏国宝的机构，人民能在其中学习人类的发展历史，并亲身接触世界的杰作。图书馆，正如卡莱尔所称的‘人民的大学’一样，是民众日常摄取其知识粮食的机关”。在经历了心灵深处的剧烈的进步与落后、富强与贫弱的震撼之后，沈祖荣先生发自肺腑地说：“倘若中国拥有富强的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学校和大学的话，我就不会对中国军备的软弱无能感到懊悔，但是，我现在为一个没有这样令举国感到自豪的教育机构的国家感到羞愧。我将来不会去详研学校制度，也不会去建造博物馆和艺术馆，但是，我会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身”[8]。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沈祖荣先生向全国图书馆界呼吁：“敌人强夺我土地，吸尽我资财，残杀我人民，犹不足以填其欲壑，而必将我们的国性铲除殆尽而后快。我们虽然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但是我们要负责保存文化的这种责任。”“这不仅恢复我们的国性，而且可以使敌人看见吾民族非凉血动物”[9]。“抗战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图书馆教育工作者最应紧张进行工作的时候。现在打仗不专是靠武力的；没有钱我们不能打仗，没有粮食我们不能打仗，没有教育文化的培养我们更不能打仗。没有钱，我们可以向别国借贷；没有粮食，我们也可以设法购运；可是教育力量不够，文化水平太低，致使国民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没有现代知识，没有生产能力，即使有较好的国际友人，也将爱莫能助”。“一个国家整体国力的养成，完全靠着教育。我们现在能向日寇面对面拼一气的，就是靠了过去和现在不断增强的教育力量。我们的武器不及敌人，我们的战士却有以血肉作长城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由教育而产生的”。图书馆应担负起“前方将士精神粮食的供给”、“受伤将士休闲教育的顾及”、“难民的教育”和“一般民众的教育”的职责[10]。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战”文华图专被迫迁往四川重庆期间，虽然文华图专的校舍几次惨遭日寇飞机的轰炸，片瓦不存，但是，沈祖荣先生仍然能够在风餐露宿、奔走于日寇炮火之下、教学于敌机轰炸之间隙的危难时刻维持文华图专于不辍，并且还创办了档案管理科，其艰苦卓绝的图书馆精神受到当时中国图书馆界的广泛颂扬，成为中国图书馆人的楷模。

早在1930年时，毛坤先生就对这种“维持人之精神”做过清晰地说明：“语云创业固难，守成亦不易，诚哉言矣。图书科自创办而后，使无沈祖荣胡庆生两先生辛苦维持，图书科早已烟消云散矣。二先生皆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科。学识优良，经验宏富，全校事物教务皆亲任之。口无余暇，手不停批；面命耳提，循循善诱。十五年武昌围城，十六年时局混乱；其他学校皆已停办，独图书科赖二人之力仍得维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其谓是乎？”[11]

作为一个中国人，裘开明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地奉献给美国东亚图书馆事

业？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要比上面两个问题的回答要复杂得多。但是，我们只要全方位地审视一下裘开明先生的人生理想与历程，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首先，我不得不说的是，裘开明先生的人生理想与图书馆精神来自于他的老师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他所体现的是文华图专的“学生之精神”。对于这种“学生之精神”，毛坤先生在1930年时亦做过精辟地论述：“我国学子，往往心神不定，见异思迁。学工学而入教育，学教育而入政治，比比皆然，习非成是。其紊乱系统，减低效能，莫此为甚。惟文华图书科之毕业学生，对于此点，至足称道。总计各届毕业学生已有五十余人，除业新闻及警务各一人而外，全数皆在图书馆服务。而图书馆事业至为繁苦，自朝至暮，饮食而外，无休息之时。且在今日图书馆员者，地位低微，报酬亦啬。见异思迁之士，鲜有能忍受之者。而文华图书科诸同学，安之若泰，且益发奋，其忠于所学，为何如哉？”[12] 因此，可以说，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精神是 文华精神的种子在美国图书馆界开花结果的体现。

其次，作为一个美籍华人，虽然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生涯基本上是在美国，但是，他一直保持着对祖国和中国文化学术的眷恋和热爱。这种情结通过数十年自觉地抢救和保存中国珍贵文献而得到了比较充分地发挥。1976年，裘开明先生在多伦多举办的“亚洲研究协会第28届年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d 28th Annual Meeting)上曾对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收藏历史做过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个说明是我们今天了解裘开明先生人生理想与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

裘开明先生将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收藏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抗日战争以前时期(1928-1937)；2、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3、抗日战争以后时期(1945-1965)。相信各位专家学者仅从这种历史分期的标题就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裘开明先生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时期(1928-1937)，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收集是通过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非正式协议进行的。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日军在发动“芦沟桥事变”以后，建立了所谓的华北政府。许多中国学者都纷纷躲避，以拒绝接受华北傀儡政府的任职。同时，由于经费的严重拮据，中国学者不得不通过出卖其私人藏书中的珍本以维持生计。那时，许多日本的游人和汉学家都涌入北京，在北京的琉璃厂和隆福寺收购中文书籍。其时，适逢裘开明先生在北京督促《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的印刷工作，为了尽可能不使中国古籍落入日人之手，于是，他在北京与日本学者和侵略者展开了购买中文古籍的争夺战，并使之延续了四年之久(1937-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接管了燕京大学，一些教授因为拒绝与日本傀儡政府合作而入狱，所以，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北京购买书籍的工作停止了，并转向中国后方。裘开明先生说：在抗日战争以后时期(1945-1965)，日本战败以后，大量的中国古籍流落日本市井，“我们开始将收集中文书籍的工作转向日本。在1950年前后，我们直接赴日本东京、京都、大坂等地的知名书店购买中文古籍，并与日本的各个机构和个人，尤其是东洋文库和日本国会图书馆，展开了中文图书收购竞争。我们一收到书目或书影，就立即开始核对我们的公务目录和订购档案，常常工作到深夜，然后，立刻用电报进行订购，以便日本书商能够连夜或在次日早晨将书寄出。即使我们用这么快的速度来发订单，我们也无法保证我们能够买到我们想购买的书籍。我们发现：在日本购买的许多中文古籍都来自华北。总之，哈佛所购得的大多数中文书都是日本人和中国游人在战时从北京和其它沦陷城市带到日本的。”[13]

我想：裘开明先生的这些直白可以说明我上面的论点。当然，它也比较明晰地回答了不少中国学人心中的一大问号——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这么多中文古籍究竟是怎么来的？言下之意是：是不是像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盗窃中国敦煌卷子那样得到的？在我初到哈佛时，郑炯文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大陆曾有两位校长访问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中一位不断地问郑炯文先生我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另一位略知原委者只好代答道：如果不是哈佛

燕京图书馆,这些中文古籍恐怕很多早已烟消云散了。我想这个回答不仅缓解了问者心中的疑惑,而且也是对哈佛燕京图书馆和裘开明先生历史功绩的一种肯定。如今,郑炯文先生秉承全面开放馆藏的传统,并以多种方式使中文古籍反馈中国学人。这无疑是裘开明先生人生理想的延续。

其三、裘开明先生对于哈佛的贡献,其表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其实在哈佛的东亚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可以说:裘开明先生献身于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乃是其弘扬东亚文化学术,尤其是中国文化学术之理想的最终归属。翻开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崛起、繁荣、兴盛基本上是与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创办与发展一致的。从梅光迪、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到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杨联笙等,哈佛大学涌现出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东亚研究专家和学者。在这些著名的东亚研究专家和学者辉煌的背后一直挺立着一位最忠实的支持者——裘开明先生。如果没有裘开明先生,那么我们就难以想象哈佛燕京图书馆今天的成就;同样,如果没有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也很难想象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今天的成就。

人们常说:哈佛的中国研究蜚声国际,执美国中国研究之牛耳,其有今日之地位,部分是因为时势造就,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人谋所致。人才、图书、资金乃是哈佛大学中国研究傲视全美之三大要素。我认为在“图书”这一大要素之中,哈佛燕京图书馆人的贡献又是最为关键的。从筚路蓝缕的裘开明先生,到发扬光大的吴文津先生,直至继往开来的郑炯文先生,哈佛燕京图书馆人始终在哈佛东亚研究中扮演着默默无闻的重要角色。

裘开明先生正是这种春风化雨的典范。费正清教授曾说:“我认识裘开明达四十年之久,在这四十年间,裘开明始终如一没有变化。当然,他变老了,我也一样,但是他总是那么友善、热忱、兴致勃勃和乐于助人。他文献知识渊博,并以向他人传授这些知识为一种快乐。”“我们与这位奠定了我们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基础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缔造者一直具有友好的专业关系,在长久的共事之后,赖肖尔(Reischauer)教授、Craig教授和我非常自然地把我们编写的1965年版教科书《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题献给了裘开明。我们的献辞写道:‘献给哈佛学院图书馆汉和文图书馆主管(1927-1929)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馆长(1929-)裘开明’——我们这样有点精确地描述行政职务是为了表明:裘博士最初是一个文库主管,后来建立了隶属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藏书——简言之,裘博士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先驱。他是我的兄长,从我接触哈佛开始,他那父亲般的风采就是哈佛引人入胜的一道风景,以致我领受他那父亲般的风采简直就如同领受一份礼物,的确,我所领受的他那父亲般的风采就是一份礼物——一份具有献身人格的珍贵礼物。”[14]我想:费正清教授在1978年所发表的这一段文字不仅表达了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且也道出了许多哈佛东亚研究专家学者的心声。

由此可见,虽然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所处的各种历史条件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图书馆精神——“智慧与服务”。他们在实现其异曲同工的人生理想的过程中共同创造和演绎了这种图书馆精神。这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生理想唱和。

3、“跨越时空”——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精神力量

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更是跨越时空的。如果说韦棣华女士是一座跨越太平洋连接中美图书馆事业的桥梁的话,那么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则是支撑这座桥梁的两端的桥头堡和向两地延伸的主干线。因为这座桥梁及其主干线的作用,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精神在中美图书馆世界之间、在自20世纪初以来的几代图书馆人

之中一直在不断发扬光大。

2000 年 11 月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举办“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八十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期间,我曾应邀专门举办过一个题为“永恒的文华精神——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历史回顾”的图片展览。在这个图片展览的前言中,我曾写道:“在 20 世纪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中,‘文华’这个光辉灿烂的名称不仅代表着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创始,代表着中国近现代图书馆运动的中心,而且代表着 20 世纪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因为‘文华人’不仅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而且演绎和推动了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如果没有‘文华’和‘文华人’,20 世纪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将不可想象。”今天,我不想过多地论述文华图专对中国大陆图书馆事业的影响,我只准备谈谈它对大陆以外地区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正是我要说明的“跨越时空”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初,著名图书馆学家严文郁先生曾对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倾毕生之精力创办和发展的文华图专对大陆以外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影响做过一个简洁的说明。

严文郁先生说:“以台湾图书馆教育而论,蓝乾章、沈宝环、周骏富三位教授在台大、师大、辅仁、淡江及世新五个图书馆学系组造就专业人才数千人,这些后起之秀,也可以说是韦、沈二师的再传弟子,一脉相衍,若是寻根,当追溯到武昌文华。绍期师一生只作了一件事,服务一个机关,因为他敬业乐业,他的弟子受其潜移默化的感召,个个以图书服务社会,埋首耕耘,使图书馆事业扎根,成长、茁壮,事虽小而影响学术、文化与教育者至大且巨。”[15]

严文郁先生又言:“文华图专虽属袖珍型的学校,先后毕业学生不过二、三百人,除打进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外,出国深造的比例相当高,现居美国者尚有十多位,虽皆垂垂老矣,可是他们曾为美国著名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奠定基础。”[16]

的确,只要我们稍微留心一下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文华图专毕业生对美国东亚图书馆的重大作用。据我初步估计,大约有不低于十分之一的文华图专毕业生曾为美国的东亚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做出过贡献。例如:曾经服务于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的桂质柏先生,曾经服务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严文郁、汪长炳、岳良木、徐家壁等先生,曾经服务于国会图书馆中文部的王文山、曾宪三、李芳馥、房兆楹、徐亮、张葆箴、陶维勋、吴宝珠等先生,曾经服务于普林斯顿大学哥斯德东方图书馆的童世纲、吴元清等先生,曾经服务于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顾家杰先生,以及先后服务过美国东亚图书馆的查修、曾宪文(裘开明夫人)、徐家麟、杨漪如、姜文锦、黄慕龄、舒纪维、富兰英、聂锡恩、黄作平等。

当然,哈佛燕京图书馆更是不会例外。在“裘开明时代”,哈佛燕京图书馆几乎是文华图专毕业生的天下。自馆长裘开明先生开始,到副馆长冯汉骥先生、于震寰先生,直到业务骨干陆秀、黄星辉、任群、邓衍林等近十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文华图专毕业生。虽然目前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服务的文华图专再传弟子只有几位,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中国的文华图专,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它都与美国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很近很近。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就可以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感觉到文华图专及其影响——文华精神的存在与延伸。这也正是我选择“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作为我的这个报告的题目的原因之一。

我在这个报告的开头说:“裘开明先生是 20 世纪西方最伟大的东亚图书馆先驱和华美图书馆学家。”这绝不是因为我在研究裘开明先生就一味地过高地评价裘开明先生,而是事实的陈述,因为作为在太平洋此岸连接中美图书馆事业桥梁的桥头堡,裘开明先生不仅是这座桥梁向美国东亚图书馆延伸的主干线,而且还是进一步向世界东亚图书馆辐射的枢纽。从这个角度来讲,裘开明先生不再仅仅属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而是属于整个西方的东亚图书馆事业。这里,我姑且不谈裘开明先生在荣休以后远赴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筹建其东亚图书馆和出

任香港中文大学首任馆长等方面的贡献，我仅就“裘氏法”——《汉和图书分类法》的影响做一点说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赖永祥先生曾对裘开明先生的《汉和图书分类法》(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and Japanese Books) 在世界各国的使用情况做过一个调查。赖永祥先生的调查结果显示[17]：在全球五大洲之中，除了非洲以外，有四个大洲的东亚图书馆使用裘开明先生的《汉和图书分类法》。其中：亚洲和大洋洲有 7 个图书馆，欧洲有 3 个图书馆，美洲有 15 个图书馆。具体情况如下：

其一、亚洲和大洋洲

- 1、中国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1949 年以前）
- 2、新加坡：新加坡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Singapore）
- 3、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Malaysia）
- 4、澳大利亚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 C. T. ）
- 5、澳大利亚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方语言文库（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Oriental Language Collection, Canberra, A. C. T. ）
- 6、新西兰奥克兰：奥克兰大学亚洲语言图书馆（1966 年——, University of Auckland, Asian Languages Library, Auckland, New Zealand）
- 7、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1967-1971 年）

其二、欧洲

- 1、荷兰莱顿：汉学研究所图书馆（Library of the Sinological Institute, Leyden, Netherlands）
- 2、英国：牛津大学中文学院图书馆（Oxford University, Chinese Faculty Library）
- 3、西德汉堡：汉堡大学图书馆东方文库（University of Hamburg Oriental Collection, Hamburg, West Germany）

其三、美洲

- 1、哈佛燕京图书馆
- 2、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Columbia University, East Asian Library）
- 3、耶鲁大学远东文库（1970 年以前, Yale University, Far Eastern Collection）
- 4、普林斯顿大学哥斯德东方图书馆（Princeton University, Gest Oriental Library）
- 5、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University of Chicago, Far Eastern Library）
- 6、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East Asiatic Library）
- 7、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1967 年以前,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Far Eastern Library）
- 8、胡佛研究所图书馆中文文库（Hoover Institute Library, Chinese Collection）
- 9、图森亚利桑那大学东方研究图书馆（1970 年以前,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Oriental Studies Library）
- 10、洛杉矶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1972 年,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Oriental Library）
- 11、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东亚图书馆（1970 年,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East Asian Library）
- 12、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日文库（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hinese and Japanese Collection）
- 13、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文库（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East Asian

Collection)

14、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Royal Ontario Museum, Toronto, Canada, Far Eastern Department)

15、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部(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Asiatic Department)

我想：上面的这份调查表已经能够比较清楚地说明我所要说明的问题。最后，我谨以我本人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训“智慧与服务”所写的说明词来结束我的报告。

智慧与服务

我们崇尚智慧，因为——

图书馆是知识的殿堂，

智慧是知识的光芒，

智慧是理想的闪光，

智慧是生命的灵光。

我们至诚服务，因为——

图书馆是信息的海洋，

服务是馆员的天职，

服务是智慧的土壤，

服务是人生的弘扬。